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的乡村创业促进效应

向雪风 唐瑜梳*

摘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与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创业活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与增强本地政府信任是该促进效应产生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效应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数字化供应链较完善的县域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深化对信息治理与基层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还为通过规范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基层政务公开;信息不对称;政府信任;乡村创业;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062.5

一、引言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驱动力量,推动工商资本下乡是破解乡村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内生增长动能的重要引擎。《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年)》指出,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行为,更好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多样化投融资需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然而,近年来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工商业发展增速放缓,部分项目因信息壁垒等问题陷入停滞甚至退出状态(毛世平等,2021),影响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

农村地区面临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问题,不仅带来制度性交易成本,还导致乡村创业活动受阻(何欣、朱可涵,2019;邱子迅、周亚虹,2021)。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选取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等15个省(区、市)的100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积极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

*向雪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611130,电子邮箱:xxf_Xiang@163.com;唐瑜梳,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01331,电子邮箱:tys18051193548@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信用环境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72573125)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化,全面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

现有研究围绕着政务信息公开的经济效应展开了广泛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务信息公开增强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刘辛、许慧,2024;张星宇、汤旭东,2025),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和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水平(Kim and Lee,2012;刘伯凡等,2023),有利于吸引高技术创业人才流入,同时提高企业和投资者对政府行为以及未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理性预期(邵磊、唐盟,2019)。这种信息不对称缓解和预期不确定性风险降低能够提高企业经营者的未来发展信心,促进企业增加生产性投资(于文超等,2023),实现投资效率以及创新产出的提升(于文超等,2020;张明昂等,2023)。事实上,相较于高层级治理中的信息公开,基层治理中的政务信息更加贴近居民生活和中小微企业经营。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基层政务通常涉及农业政策动向、资金补贴、创业扶持等关键信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基层政务公开能够增强政策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种基层治理的标准化规范化是否有利于激发乡村创业活力?现有文献较少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优化基层治理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基于县域面板数据,以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本文基于乡村创业的视角,评估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的溢出效果,拓宽了基层政务公开经济效应领域的研究。在已有关于政务公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其对治理效能提升方面的影响,也有少量学者从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范亚丽等,2025)、企业创新(张明昂等,2023)等角度讨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影响,但缺乏关于创业活动影响的文献,特别是缺乏对乡村地区创业活动的关注,本文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补充。二是本文从信息经济学与政府信任的双重视角,揭示了基层政务公开促进乡村工商业发展的内在机制,阐释了标准化规范化基层治理如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强政府信任来激活经济主体行为,为理解政府有为如何促进乡村市场有效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本文拓展了创业影响因素中的基层治理视角。虽然现有部分文献从治理数字化转型(何雨可等,2024)、数据治理(陈晔婷等,2024)和治理结构(张浩等,2025)等角度讨论了政府治理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对基层治理的关注仍相对缺乏,本文从乡村创业的视角对基层治理影响创业活动的文献进行了补充。四是本文的实践贡献在于识别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异质性影响,揭示其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数字化供应链水平较高地区的突出价值,为如何通过精准施策以实现基层政务公开经济效应最大化提供了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有研究表明,乡村创业者在进行创业决策时,会面临以下三方面因素的约束:一是创业资源的约束,其直接决定了潜在创业者创办并维持企业运营的能力,包括信贷资源约束(韩先锋等,2025)和人力资本约束(马双、胡雯毓,2025)等,当资源约束得到缓解时,居民选择创业的概率更高。二是创业成本的约束,该因素影响居民创业收益预期和创业意愿。

创业成本可以大致划分为当前创业成本和未来预期成本两类,当前创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信息成本、机会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周洋、华语音,2017;赵佳佳等,2023)等,而未来预期成本则与创业者对未来经济和政策的预期密切相关(杨紫等,2024)。三是创业机会的约束,该因素影响着创业方向的准确性与创新性,其取决于市场因素和创业者对信息的获取和识别(韩先锋等,2025)。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基层政府依托标准化、规范化的政务公开体系,逐步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将碎片化的产业政策、审批流程、扶持政策和监管要求等信息整合至统一、透明的政务公开信息化平台。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乡村创业活动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帮助潜在创业者快速识别投资机会,还能够通过反馈机制进一步增强本地政府信任(刘伯凡等,2023),从而降低居民对经济政策与治理策略不确定性的担忧。因此,本文认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增强政府信任对乡村创业活动产生促进效应。

(一)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信息不对称缓解与乡村创业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在乡村创业活动中,由于信息获取途径有限等原因,基层政府和农村居民、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潜在创业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面临不确定性风险,会抑制其投资动机和创业意愿。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通过制定统一的政务公开标准和规范,明确了基层政务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方式和时限等要求,促使基层政府将各类政务信息进行全面、及时地公开。同时,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如政务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拓宽政务信息的传播渠道,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刘伯凡等,2023),保障了基层治理信息的完整性和时效性。创业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更加便捷地获取乡村基层政务信息,对乡村投资环境和相关的扶持政策进行全面了解和动态监测。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表现为信息的绝对缺失,更深层次的原因往往在于既有信息难以被有效利用。为此,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对政务信息进行统一、清晰、易懂的格式化处理,同时强化对政策文件的解读,将繁复的政策文本转化为简洁的办事指南、生动的政策图解和条理清晰的清单列表。这种政务信息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降低公众对政策信息的解读成本,使得即便不具备专业背景的投资者与创业者,也能高效、准确地理解政策核心与乡村发展实况(何雨可等,2024)。充分掌握乡村政务信息能够帮助潜在投资者和创业者更加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从而积极推动工商资本向乡村地区流动,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蔡运坤等,2024)。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1: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乡村创业。

(二)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政府信任增强与乡村创业

政府信任程度是影响创业者对未来经济政策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预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不仅要求基层治理组织全面、及时地向社会各界公开各类政务信息,包括财政预算、项目审批、涉农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等,更注重政务信息发布的互动性和反馈性,通过建立政民互动机制实现政务信息从单向发布到双向沟通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潜在创业者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例如,政府开放日等活动使创业者可实地了解政府运作,直观感知行政效率与公正性;政民互动平台则借助领导信箱、在线访谈等方式,及时回应创业者和投资者的疑问。这种互动机制增强了潜在创业者对基层治理组织的信任(何文盛、何

忍星,2023)。另一方面,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增强民众对基层治理组织的监督,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清廉的基层政府形象,从而增强市场主体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基层政府信任的增强能够提高潜在涉农创业者对未来创业的信心,从而提高其收益预期,实现乡村投资动力和投资意愿的提升(Easley and Lee,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2: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增强政府信任促进乡村创业。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入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单位的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来估计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的实际影响。为了降低潜在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控制了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

$$Rural_entrep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rho County_{it} + \mu_t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1)中: $Rural_entrep_{it}$ 为被解释变量乡村创业活动,用于衡量县域*i*在第*t*年的乡村创业情况; DID_{it} 为基层政务公开虚拟变量,用来衡量县域*i*在第*t*年是否受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的影响; α_1 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用于估计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影响; $County_{it}$ 为县域*i*在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特征变量, ρ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μ_t 和 δ_i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县域固定效应; α_0 为模型的常数项;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降低不同时期随机扰动项之间自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将所有估计模型的标准误差均聚类到县域层面。

(二) 变量选择

1. 乡村创业活动

本文的乡村创业指在农村地区利用相关资源从事创业经营活动。现有文献对县域乡村创业活动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中的农林牧渔业新注册企业数量来衡量乡村创业活动(马双、胡雯毓,2025);二是,利用浙江大学卡特-企研乡村产业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来衡量各县域的乡村创业活动(阮建青等,2024;李刚等,2024)。由于后者包括了农业及相关产业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和家庭农场创业三个方面^①,相较于直接使用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中新增涉农企业数量而言,该指数还突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家庭农场的重要性,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乡村创业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基准回归将乡村创业活动变量定义为乡村创业指数的对数,但在后文使用农林牧渔业新注册企业数量和微观农村家庭工商业经营情况进行稳健性检验。

2. 基层政务公开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基层政务公开,其衡量了县域是否受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①具体测度指标包括:每万人农林牧渔业新增主体数、每万人农林牧渔业新增股权投资笔数、每万人涉农加工制造业新增主体数、每万人涉农加工制造业新增股权投资笔数、每万人涉农服务业新增主体数、每万人涉农服务业新增股权投资笔数、每万人合作社新增主体数、每万人合作社新增成员数、每万人个体家庭农场新增主体数、每万人企业类家庭农场新增主体数。

范化试点政策的影响。若县域在 2017 年入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试点,则基层政务公开变量在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可能同时影响乡村创业和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潜在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地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和医疗资源供给等特征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县级层面的数据来讨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影响,由于该政策于 2020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本文主要使用 2014—2020 年的县域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但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拓展至 2014—2022 年的县域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乡村创业指数数据来自浙江大学卡特-企研乡村产业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特征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电子政务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数据分别来自国脉电子政务网和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官网;本地政府评价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区县政府政务关注程度和政府信任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城镇化率等数据来自《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不含市辖区样本,同时考虑到市辖区城镇化率较高,本文的实证数据仅为县和县级市样本。本文对主要变量存在较少缺失的样本使用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和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对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予以剔除。最终,基准回归得到 1770 个县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 9760 个观测值。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乡村创业活动	乡村创业指数的对数	9760	2.452	0.348	2.486
基层政务公开	政策虚拟变量	9760	0.019	0.135	0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的对数	9760	13.918	1.042	13.970
地区人口规模	年末人口数量(万人)的对数	9760	3.559	0.832	3.648
地区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9760	0.402	0.108	0.397
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9760	0.707	0.405	0.615
政府财政支出	预算内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9760	0.334	0.329	0.236
医疗资源供给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对数	9760	7.264	0.874	7.34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报告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在第(1)列未控制县域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变量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创业活动。第(2)列进一步对县域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后,基层政务公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0582,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促进乡村创业活动的结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从经济意义来看,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使试点县域乡村创业活动增加了5.82%,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的促进效应具有经济显著性。

表 2 基层政务公开与乡村创业活动:基准回归

变量	乡村创业活动	
	(1)	(2)
基层政务公开	0.0538* (0.0296)	0.0582** (0.0287)
经济发展水平		0.0581** (0.0276)
地区人口规模		-0.1855*** (0.0400)
地区产业结构		0.0279 (0.0757)
金融发展水平		0.0224 (0.0220)
政府财政支出		0.0586 (0.0596)
医疗资源供给		0.0373* (0.0214)
常数项	2.4509*** (0.0006)	1.9851*** (0.4902)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760	9760
调整的 R ² 值	0.7094	0.7119

注:*、**和***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具有显著性,括号内为聚类到县域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基准回归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实际影响,但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即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对照组的结果变量不存在显著的事前趋势。违背平行趋势假设可能会引发对反向因果导致内生问题的担忧,同时会在识别中引入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Jacobson et al.,1993;牛耕等,2024),使用事件分析法来检验基准回归模型的设定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识别前提。本文构建了如下事件研究法的模型:

$$Rural_entrep_{it} = \beta_0 + \sum_{k=-3, k \neq -1}^3 \beta_k \times Policy_{ik} + \rho County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模型(2)中: $Policy_{ik}$ 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政策开始实施前后的第k年; β_k 为对应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如果政策实施前(即k小于0),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则可以认为双重差分模型的设定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本文在90%的置信区间下,绘制了如图1所示的动态效应图。图1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对照组的结果变量不存在显著的事前趋势,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实施后,政策虚拟变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显著性,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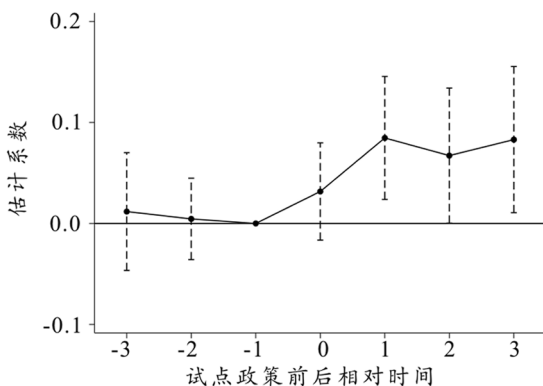


图1 动态效应图

(三) 稳健性检验^①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从替换被解释变量、引入微观家庭数据、调整样本期、排除“坏”控制变量、增加额外控制变量、控制特定处理组时间趋势、内生性讨论以及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八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创业活动,理论分析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与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和政府信任增强有关。本文参考薛笑阳等(2025)、刘勇政等(2025),从异质性影响的视角进行机制检验,其核心思路在于:如果以上两条影响渠道真实存在,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种影响应该在原本信息不对称严重和政府信任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

(一) 信息不对称缓解机制

在信息需求端,信息基础设施是影响信息获取便利性和实际获取成本的重要因素(周记顺、宋颜希,2022),而居民对政务信息的关注体现了其对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因此,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的地区以及缺乏对政务信息关注的群体通常面临更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更严峻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供给端,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更高的地区,政务信息透明度越高,居民获取政务信息和最新创业政策动态的难度与成本都相对更低,对应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弱(刘伯凡等,2023)。基于以上角度,如果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乡村创业活动,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种促进效用应该在原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政府政务关注不足以及政务公开较为薄弱的地区更加显著。

首先,本文利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中的信息基础设施指数来衡量各县域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其中包括县域每万人移动设备接入数和每万人5G基站数两个具体指标^②。本

^①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经济评论》网站(<http://jer.whu.edu.cn>)附录。

^②由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从2018年开始发布,尚无法获取2017年的县域信息基础设施指数。但作者通过比较2018年和2019年的指数发现:虽然不同年份县域的数字乡村指数绝对值存在纵向变化,但短期内基于信息基础设施指数的县域相对排名并未发生较大波动,基于2018年指数划分的组别对于政策前2017年也具有较弱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使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中的信息基础设施指数来近似衡量政策前各县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相对高低。

文基于该指数的中位数引入高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虚拟变量,当某县域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小于中位数则取值为 0。在表 3 第(1)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与高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原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的县域中更加明显。

其次,本文利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受访者关于“您平时是否关注区县政府的政务情况”问题的回答,计算了居民对区县政务的平均关注程度。该均值越高表明地区居民对政务信息的关注度越高,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越弱,本文基于各地区均值的中位数构建高政务关注度的虚拟变量。在表 3 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与高政务关注度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用在原本政府政务关注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

最后,本文利用国脉电子政务网发布的 2017 年电子政务指数中的政务公开指标来衡量政策实施前地方政府的政务信息公开情况,并基于该指数的中位数构建高信息公开水平的虚拟变量,讨论不同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地区的政策效果。在表 3 第(3)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和高信息公开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原本政府政务信息公开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

以上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乡村创业。

表 3 机制检验:信息不对称缓解

变量	乡村创业活动		
	(1)	(2)	(3)
基层政务公开	0.1020 ^{***} (0.0363)	0.1009 ^{***} (0.0377)	0.1055 ^{***} (0.0337)
基层政务公开×高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0.1032 ^{**} (0.0492)		
基层政务公开×高政务关注度		-0.1037 ^{**} (0.0491)	
基层政务公开×高信息公开水平			-0.1071 ^{**} (0.04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701	9256	8924
调整的 R ² 值	0.7120	0.7029	0.7096

(二) 政府信任增强机制

为了验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是否能够通过增强本地政府信任促进乡村创业活动,本文进一步从本地政府评价和政府合作意愿两个异质性视角进行探讨。

在本地政府评价方面,本文借鉴刘伯凡等(2023),将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受访者关于“您对去年本县/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问题的回答在地区层面进行加总,并计算每个地区居民对本地政府工作评价的均值,均值越高表明居民对本县域政府的信任越强。本文基于各地区均值的中位数构建高政府评价的虚拟变量。在表 4 第

(1)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与高政府评价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原本区县政府评价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

在政府合作意愿方面,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受访者关于“您是否愿意与当地政府进行项目合作”问题的回答,计算了地区层面与政府合作意愿的均值,合作意愿越强表明居民对本地政府部门的信任水平越高。本文基于该均值的中位数构建高政府合作意愿的虚拟变量。在表4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与高政府合作意愿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原本与政府合作意愿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增强本地政府信任促进乡村创业。

表4 机制检验:政府信任增强

变量	乡村创业活动	
	(1)	(2)
基层政务公开	0.1097** (0.0451)	0.0798*** (0.0281)
基层政务公开×高政府评价	-0.0968* (0.0513)	
基层政务公开×高政府合作意愿		-0.2118** (0.08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760	9256
调整的R ² 值	0.7120	0.7031

六、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发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增强本地政府信任促进乡村创业,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县域对该政策的实际反应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从乡村市场规模、数字化供应链建设水平两个角度来分析潜在的异质性。

(一)乡村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影响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通常蕴藏着更多的创业机会与更大的产品需求市场。因此,在市场规模较大的乡村地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可能更加显著。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的视角验证基于乡村市场规模的潜在异质性,人口城镇化率越低,表明乡村地区的常住人口越多,对应的市场规模越大。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人口城镇化率的中位数引入高城镇化率的虚拟变量,当县域城镇化率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该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在表5第(1)列基于乡村市场规模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与高城镇化率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的促进效应在城镇化率低即乡村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更加显著。

(二)数字化供应链

货物和产品运输是乡村创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物流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创业者能够

以更快的时效和更低的成本将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配送至消费市场。因此,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地区,创业者的销售渠道更多,参与创业活动的便利性更高,可能更好地激发乡村创业活动。基于此,本文利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中的“数字化供应链指数”来衡量乡村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具体包括每万人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接收包裹的物流时效和物流仓库数三个测算指标。本文基于该指数的中位数构建高数字化供应链虚拟变量,指数大于等于中位数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在表5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基层政务公开和高数字化供应链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化供应链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

表5 异质性分析:乡村市场规模与数字化供应链

变量	乡村创业活动	
	(1)	(2)
基层政务公开	0.1319*** (0.0401)	0.0021 (0.0442)
基层政务公开×高城镇化率	-0.1163** (0.0544)	
基层政务公开×高数字化供应链		0.1036** (0.05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386	9701
调整的R ² 值	0.7113	0.7120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政策,利用2014—2020年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影响。首先,本文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创业活动,推动乡村工商业发展。其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缓解和居民对政府信任增强是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促进乡村创业的重要渠道。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对乡村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乡村市场规模较大、数字化供应链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落实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虽然,当前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部分县、乡、村出现了信息收集整理缓慢、公开不及时、政策解读不全面、审核把关不严格、信息公布过度以及发布流程不规范等现象。一方面,需要制定统一的政务公开标准,建立严格的信息发布审核流程,明确基层政务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不同政务信息的公开方式,同时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对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认识。另一方面,强化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的评估与监督,建立动态监督和反馈机制,推动县、乡、村多级政务公开专区常态化运行。

第二,提高基层治理信息透明度,降低乡村创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精准公开创业扶持政策,针对乡村创业者最关心的融资支持、税收优惠、土地租赁等问题,政府应提供清晰、

易懂的政策解读,并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扩大传播。其次,要加快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例如,在乡镇层面设立创业服务联络员,负责收集并反馈创业者的政策需求,确保信息双向流动。同时,公开财政补贴发放、项目招标等关键信息,增强创业者对政府的信任感。最后,基层治理组织要以政务公开为契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为乡村创业者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公开透明、结果公平公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乡村创业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第三,推进乡村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村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乡村数字化供应链的发展能够为乡村创业者拓宽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渠道,有利于促进商品在城乡和跨区域间的流通,能够增加乡村的创业机会、降低创业成本。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物流等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同时及时公开县域物流中心建设规划、电商服务站点布局、冷链仓储补贴政策等信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县—乡—村多级物流体系。另一方面,推动政务公开数据与供应链企业对接,例如与本地电商平台共享创业主体资质信息等,让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能够减少审核程序直接入驻平台,与物流企业共享创业订单信息,优先调度运力,缩短商品跨区域运输的时间成本。

参考文献:

1. 蔡运坤、周京奎、袁旺平, 2024:《数据要素共享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公共数据开放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2. 陈晔婷、李正彪、何思源, 2024:《政府数据治理与创业活跃度——来自政府政策文本数据的证据》,《宏观经济研究》第5期。
3. 范亚丽、黄京磊、张新芝、谢丹夏、尹柔涵, 2025:《政务服务信息公开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基于省级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5期。
4. 韩先锋、肖坚、朱承亮, 2025:《数字乡村政策实施能否激发村庄创业活力》,《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5. 何文盛、何忍星, 2023:《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一项调查实验》,《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6期。
6. 何欣、朱可涵, 2019:《农户信息水平、精英俘获与农村低保瞄准》,《经济研究》第12期。
7. 何雨可、牛耕、逯建、赵国昌, 2024:《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8. 李刚、王雨菲、颜廷武, 2024:《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乡村创新创业吗——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经济学家》第12期。
9. 刘伯凡、赵玉兰、梁平汉、张军, 2023:《政务新媒体与地方政府信任:来自开通政务微博的证据》,《世界经济》第5期。
10. 刘辛、许慧, 2024:《政务新媒体的环境治理效应——来自环保官微发帖的证据》,《财经研究》第7期。
11. 刘勇政、徐哈帆、邓怀聪, 2025:《减税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投资效应》,《经济研究》第5期。
12. 马双、胡雯毓, 2025:《新型城镇化与工商资本下乡——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经济科学》第1期。
13. 毛世平、张琳、何龙娟、陈秧分、贾伟、吴文斌, 2021:《我国农业农村投资状况及未来投资重点领域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14. 牛耕、向雪风、周洋, 2024:《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15. 邱子迅、周亚虹, 2021:《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增收作用的机制分析——基于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的微观检验》,《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16. 阮建青、杨奇明、叶武威、张雨薇, 2024:《中国乡村创新创业发展:指数构建与测度分析》,《经济与管理》第5期。
17. 邵磊、唐盟, 2019:《政府财政透明“稳预期”了吗?》,《财政研究》第8期。
18. 薛笑阳、刘红劭、王永钦, 2025:《集体诉讼制度与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证据》,《管理世界》第8期。

- 19.杨紫、张勋、黄卓、谭莹,2024:《经济不确定性、个体创业与创业机会不均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 20.于文超、梁平汉、高楠,2020:《公开能带来效率吗?——政府信息公开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21.于文超、刘丽、陈刚,2023:《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研究》,《经济评论》第6期。
- 22.张浩、程名望、张财经、郑淋议,2025:《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基于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 23.张明昂、鲁书伶、邵小快、白彦锋,2023:《政府信息公开、企业确定性预期与创新表现》,《财经研究》第4期。
- 24.张星宇、汤旭东,2025:《政务新媒体与城市对高技能创业人才的吸引水平——来自政务微信公众号开通的证据》,《财经研究》第3期。
- 25.赵佳佳、魏娟、刘天军,2023:《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 26.周记顺、宋颜希,2022:《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出口的影响——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产业经济研究》第5期。
- 27.周洋、华语音,2017:《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 28.Eesley, C., and Y. S. Lee. 2022. "In Institutions We Trust?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4(2):532-556.
- 29.Jacobson, L. S., R. J. LaLonde, and D. G. Sullivan. 1993. "Earnings Losses of Displaced Work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4): 685-709.
- 30.Kim, S., and J. Lee. 2012. "E-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2(6): 819-828.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tandardized and Regulated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Xiang Xuefeng¹ and Tang Yushu²

(1: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is an effective pathway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ilot policy for standardizing and normaliz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and county-level panel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uch standardization and regulation o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tandardized and regulated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 conclusion supported by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enhancing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is promoting effect occu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show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unties with larger rural market scales and well-developed digital supply chain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ositive role of standardized and regulated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in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offers important policy insights for fostering rur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rough standardized and regulat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Grassroots Government Affairs Disclosure, Information Asymmetry, Government Trust, Rural Entrepreneurship, Rural Revit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Q12, R51

(责任编辑:惠利、陈永清)